

July 2021

From Commitment to Uselessness: On Georges Bataille's Concept of Literature

Tianshu Zh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o, Tianshu. 2021. "From Commitment to Uselessness: On Georges Bataille's Concept of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4): pp.129-13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4/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文学的介入之用到文学的无用之用：试论巴塔耶的文学观

赵天舒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比对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和巴塔耶与之相对立的文学愿景，探讨巴塔耶独特的文学观。介入文学的核心意义在于文学的介入之用，其三个重要原则分别是文学服务社会，文学承载意义，文学是社会历史的积极推动力。针对萨特的观点，巴塔耶提出了文学无用的思想：文学是至尊的耗费行为，文学呈现世界的未知，文学的核心是无用的否定性。这种思考体现了巴塔耶对文学现代性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文学作为一种反抗社会与历史的否定性力量，呈现出一种无用的特征，但这种无用性并非否定一切，而是在更深的维度中思考人的存在，以求解放主体性，恢复人的主体价值。

关键词：介入文学；至尊性；耗费；未知；无用的否定性；主体性

作者简介：赵天舒，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文学、语言、表演博士院美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文艺美学、法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法国巴黎南特尔共和国大道 200 号巴黎第十大学文学、语言、表演博士院，92001。电子邮箱：hippofis@163.com

Title: From Commitment to Uselessness: On Georges Bataille's Concept of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George Bataille's concept of literature by comparing it with Jean-Paul Sartre's opposite view of committed literature. Sartre considers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as core of literature, requiring literature to serve society, convey meaning, and advance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In response to Sartre's view, Bataille argues that literature is useless. He recognizes literature as a sovereign activity of expenditure and argues that it should only present the unknown of the world, which sheds light on unemployed negativity as the core of literature. In this sense, Bataille's concept is a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Literature, as a resistant and negative force against society and history, shows a characteristic of uselessness. Yet, this uselessness is not a negation of everything. In contrast, it is a way to contemplate human existence at a more profound level, in order to liberate human subjectivity from alienation.

Keywords: committed literature; sovereignty; expenditure; unknown; unemployed negativity; subjectivity

Author: Zhao Tianshu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Doctoral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Theater, Paris-Nanterre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esthetics, and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Address: Doctoral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Theater, Paris-Nanterre University, 200 Avenue de la République, Nanterre, Paris 92001, France. Email: hippofis@163.com

在西方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萨特提出“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的概念，^①实际上是为了调整文学的发展方向，整合文学与社会的总体关系。法国现代文学自 19 世纪中期诞生并开始发展，其最核心的特征，是文学逐渐脱离社

会，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独立封闭的场域。换言之，文学拥有了以美学为标准的独立评判体系，不再依附于社会政治与道德准则，而作家则或多或少主动与社会时政保持一定距离。但是 20 世纪前半叶混乱的国际局势与动荡的政治环境，尤其

是新的阶级矛盾的出现,强烈冲击着作家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创作伦理。萨特深刻认识到文人故步自封、自娱自乐所带来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形式主义游戏。他力主文学应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尤其应当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服务,以试图重新弥合文学同社会之间的鸿沟。

不过,作为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萨特宣扬的介入文学在某些方面过于极端,形式完全让位于思想,这使得文学丧失了其特有的文学性,丧失了美学价值,成为某种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种观念直接消解了文学本身的存在意义,使其完全沦为了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理念的附庸。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介入文学退潮之际,学界在批判萨特文学观的基础上,又一次反思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反思文学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潮流之中,不乏巴特、阿多诺等著名批评家。^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介入文学的论争,并不是直到其热潮退去时才开始出现的。在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也就是介入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的同时,法国文坛就已经出现了反对萨特文学观的声音,这当中尤以巴塔耶为代表。他对介入文学的思考,尤其是他自己的文学愿景,构成了法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一批随后成长起来的、被归入“法国理论”这一范畴中的著名思想家。^③

萨特的介入文学概念,主要出现在他于1945年为《现代》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以及两年之后发表的《什么是文学?》当中。在后者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都在影射巴塔耶,尤其针对他于1943年出版的《内在体验》一书。相对而言,巴塔耶的文学观则没有这么系统,他对文学的论述零散分布在他的各个作品与文章当中。1957年出版的《文学与恶》,是巴塔耶唯一一部关于文学的专著,但是该作品也并不是一部系统阐发其文学理论的著作,而是以单篇的形式,收录了他之前为不同作家所写的文学评论。然而,无论是在巴塔耶的前期作品,还是在《文学与恶》当中,都能找到很多或明或暗与萨特针锋相对的论点。^④鉴于萨特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在国内已有相应的译介和研究,而巴塔耶的文学思想在国内研究界则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又鉴于巴塔耶生前虽然并未与萨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论争,但是他对文学的诸多设

想都站在萨特的对立面,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试图借助萨特介入文学和巴塔耶文学观的对比研究,阐述巴塔耶自己独特的文学愿景。通过参照文学介入之功用与这种文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性,笔者以为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巴塔耶所提倡的文学之无用性,并阐发这种思想对重塑主体性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一、文学与社会:介入的工具或至尊的耗费

萨特介入文学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文学介入政治生活,为社会服务。作家不仅仅要服从创作本身的美学原则,更要在“美学律令的深处分辨出一种道德律令”(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111)。在他看来,社会道德与政治理念凌驾于美学原则之上,文学性并不足以让作品本身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其价值是通过服务社会体现出来的。因此,文学的目的不在于自身,它服务于一个更高级的理念,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作家创作,也意味着将文学作品抵押给社会,作品只是抵押物,作者通过作品与社会签订契约,向社会负责。^⑤在《现代》杂志发刊词中,萨特通过回溯法国作家介入社会的传统而明确呼吁,作家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负责,积极参与到社会与政治事务之中:

我以为,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发生的镇压,福楼拜和龚古尔都要对此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写出一行阻止镇压的话来。有人会说,这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那么,卡拉冤案是伏尔泰的分内之事吗?德雷福斯事件与左拉有何关系?刚果政府又关纪德什么事?这三位作家,每个人都在自己一生所处的具体环境中,考量了一个作家应负的责任。(Sartre, “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 13)

而在《什么是文学?》的第四章中,这种呼吁更进一步,具有了明确的时代目标与要求:1947年以来的作家,应当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写作,用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

让文学服务于外部的、更高的理想,对于这样一种观念,巴塔耶非常不以为然。在其1950年写

给勒内·夏尔的信中,巴塔耶表达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相斥的观点,表面在回应夏尔,实际上却在针对萨特的介入文学:

文学与具有强迫性的介入之间的相斥性,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事物之间的那种相斥性。介入的人所写的东西,从来就要么是谎言,要么不是介入。如果既非谎言又是介入,那是因为他的介入并非源自一种因责任或义务之情而作出的选择,而是源自一种激情,一种无法压抑的欲望,在这种激情与欲望中,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Bataille, “Lettre à René Char” 23)

在此,巴塔耶首先批判了萨特存在主义观点的基本原则之一——选择。出于外部社会道德准则的强迫性而作出的选择,不应当成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文学并不产生于作家同社会的契约所带来的责任要求,而是服从于作家内在的激情与欲望,服从于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如果由此而生的文学作品符合萨特所谓的介入原则,那也仅仅是偶然情况,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由此,巴塔耶认为文学具有“至尊性”(souveraineté),认为文学不屈从于外在的理念与价值,不承认任何在它之上的权威;它是作家自我内在动力的产物,因此自己拥有绝对权威。^⑥

为何文学应当是至尊的,而不应该屈从于社会的要求?这个观点与巴塔耶终其一生所思考的问题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30年代的《耗费的概念》到1949年发表的《被诅咒的部分》中提出的“普遍经济”(économie générale)理论,巴塔耶一直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层面反思现代社会的实质与问题,并探索其反面与异质的部分。在他眼中,构成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功利性,而符合社会原则的人类活动则是以一个确切目标为前提进行财富生产和积累的活动。但是从本质上看,文学创作有悖于这个原则,因为它不以任何目标为前提,不产出任何实质性的财富与价值,甚至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不管作家愿意与否,文学的精神永远偏向浪费,缺乏明确目标,它是激情的产物,激情不侵蚀其他对象,仅仅侵蚀自我,侵蚀自我就是它的目的。任何社会都以功利性为导向,

而文学[……]永远与这一导向相悖。”(“Lettre à René Char” 25-26)在巴塔耶看来,耗费行为是至尊的行为,因为它的动因和目的不是某个外部理想,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价值并没有被悬置于它自身之外的东西;它诞生于内在激情,并以侵蚀与消耗自我为目的,因此它得以充分与完满地实现自我存在,并享有对这一存在价值的唯一解释权。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所谓的政治介入符合社会运行的模式,符合功利主义原则,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理想为目标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相反,文学因其是一项单纯自我消耗的行为而具有至尊性,它以自身为目的,不应被外部因素所异化。所以巴塔耶认为介入与文学是不相容的,当文学开始服务于某种社会理想,成为达成某种政治理念的工具时,它便会脱离其本身的逻辑,丧失掉其独特性,变成千篇一律的残次品。

这种文学作为一种至尊的耗费活动的观点,巴塔耶在后来的《文学与恶》中作了进一步阐发。在他看来,波德莱尔和卡夫卡的创作,都符合这样的原则,以至于他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之中,不被主流价值所接受与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波德莱尔的文章中,巴塔耶将矛头直指萨特,批驳萨特在其论述波德莱尔的著作中展现出的文学观。萨特认为,当下的意义由未来决定,人的存在价值由其未来将会实现的目标决定。但是巴塔耶认为这一原则仅仅适用于“工作的乏味世界”,适用于以功利主义为基本教义的劳动社会。相反,在“诗歌的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与融合发生在当下,发生在文学创作的即刻之中(Bataille,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194-196)。可以看到,在此巴塔耶将他对功利活动与耗费活动的区分,从单纯的社会学维度上升到了一个形而上的维度,纳入主客关系与时间的范畴之中。在任何以未来规划、以某一既定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的功利活动里,主体存在的意义总是被悬置在一种时间的吊诡里,悬置在永远不会达到的将来时态当中。人的存在永远是一种未完成时,永远处于异化的状态。而耗费行为则正相反,耗费的主体只着眼于当下的即刻,着眼于激情与欲望爆发的瞬间,在其中充分实现存在的价值,享受片刻的至尊性。

因此,萨特和巴塔耶的分歧,本质上在于他们对主体与客观社会关系的认知存在差别。萨特坚

信人是万能理性的奴仆,认为在任何活动中,人都可以通过理性去理解未知之物,完成未竟之事。但与此同时,人的主体存在也因此而被异化为工具,因为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其价值的实现永远依托于下一个未来目标的达成。而巴塔耶则在理性的场域之外,找到了人类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一种拒绝工具理性的参与、完全臣服于主体内在冲动的耗费行为。在这种行为之中,存在本身即为目的,完全沉浸于此刻的情感爆发,充分实现主体价值。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功利行为的介入文学,实际上消解了作家的主体价值,将之转嫁到了一个外在的、未来的社会理想之上。相反,真正的文学作为一种全心全意于当下的耗费行为,是对作家主体性的承认,也是实现其存在价值的方式。所以文学创作首先是且只是主体的一个至尊行为,由这一行为产生的作品与行为本身已无关联,作品也许会对外部客观世界有所影响,但这些对于创作主体而言都无关紧要。从根本上来看,萨特眼中的文学与客观现实是同质的,是社会与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必然意味着介入。但这就导致他所倡导的介入文学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文学若完全与介入相融合,便会丧失自我的至尊性,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一旦试图与现实保持距离,则意味着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萨特对于波德莱尔、福楼拜等现代作家,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批判态度。反之,巴塔耶认为社会与文学这两个场域在根本上是异质的,外部社会需要人让渡自我的主体性,而文学则恢复并尊崇人的内在主体性。他从未否定社会现实,否认理性框架下劳动、生产与工作的意义,但文学本质上并不属于这一领域。

二、文学与语言:意义的载体或未知的呈现

文学的基础是语言,而从语言的层面来看,萨特和巴塔耶依旧持有对立的观点。《什么是文学?》中最著名的论述,应当是萨特在第一章中提出的诗歌和散文的区分,因为此论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是后人批评介入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萨特认为,“词语首先并非对象,而是对对象的指涉。首先要知道的并非它们招人喜欢还是令人讨厌,而要知道它们是否正确指涉了世界上的某个东西或某个概念”(*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70)。由此

推演,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媒介。其作用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揭示,将世界的本质展现在人类面前。而散文正是依托于语言的中介功能,力求清晰表达思想的文体。由于介入文学的宗旨是思想高于形式,重要的是作品传达出介入的思想。因此在萨特看来,散文才是文学介入社会的最佳体裁。相反,诗歌刻意抛弃了语言传达信息的功能,因为它并不以表述清晰、明确的思想为目的。语言在诗歌中不再是表意的工具与手段,它本身成为写作的目的。诗歌的核心就是晦涩的语言游戏,是由词语组成的纯粹美学形式。因此萨特认为,诗歌同音乐、绘画和雕塑这类仅表现形式美而不传递思想的艺术一样,是无法介入的。由此可以看出,萨特将他的功利主义观点带入了语言的层面,语言首先要服务于思想,表达意义,充当理念的传声筒,其形式与美学价值则永远处于次要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区分了散文与诗歌:“散文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我愿意把散文作者定义为一个使用词语的人。”(*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70)相反,诗歌“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词语),甚至完全不使用它们,我觉得诗歌反而服务于它们。诗人就是拒绝使用语言的人”(63)。

在谈论散文与诗歌区别的时候,萨特有意引用了一个马与黄油的例子。虽然只是一句带过,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正是巴塔耶在《内在体验》中谈论诗歌时所用的例子。^⑦由此可见,在对诗歌的这部分论述中,萨特所针对的正是巴塔耶的思想。何谓诗歌?在巴塔耶看来,诗歌是“一场献祭,而词语是这场献祭中的牺牲品”。“我们使用词语,我们使之成为功利行为的工具”。语言的功能是传递信息和思想,它是知识的载体,人类当然无法离开这种功能而生活。但“如果语言之于我们完全是功利性的,我们将毫无任何人性可言”。诗歌所做的,正是牺牲了语言的这种表意性,它将人“从知领向未知(inconnu)”,将“不可知”置于我们面前(Bataille,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156-157)。也许此时的巴塔耶,其思想表述还过于晦涩难懂,俨然一个萨特口中的“新神秘主义者”。^⑧但是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一点:诗歌,或者一切纯文学与艺术,并非仅仅是如萨特笔下那般纯粹的形式游戏,它也在试图交流与传递某种内容,试图

将读者带向未知。而在《文学与恶》里评论热内的文章中,巴塔耶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念,并再一次将矛头直指萨特。语言的作用是交流,而巴塔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交流类型:“我理解的交流,只有在那种弱的交流,亦即世俗语言的交流(或如萨特所言,那种建立在让我们自身、让世界变成完全透明的散文之上的交流)失效的时候,才最强大,就如同黑夜一般。”所谓“弱的交流”,是“世俗社会(即劳动与生产力相结合的劳动社会)的基础”,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常进行的用以表意的交流,建立在语言工具性基础上的交流;而“强的交流”则属于文学世界,其目的不在于传递任何信息,而在于将交流的主体置于一种“不透明”之中,这不透明是主体的“最终归宿”(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311-312)。

萨特强调通过语言将世界以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巴塔耶则并不认为语言是万能的,主张应在文学之中牺牲语言的表意功能,将主体置于未知与世界的不透明之中。这种对立的背后,是二人对人的认知与语言能力的不同看法。萨特依然默认理性的强大,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人的理性被认知与把握。在对未知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他与巴塔耶有着本质差异。在他看来,所谓未知就是还未能够,但终将会被理性所知的东西。因此,运用作为理性产物的语言来揭示世界,意味着首先将世界作为认知的客体被主体同化、占有与吸收,然后再以明晰的意义形式呈现出来。相反,巴塔耶认为客观世界本身并非完全透明,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去认知并通过语言去呈现,它拥有一个晦暗的部分,反抗理性,拒绝认知主体的同化,构成了不可被交流与传递的未知。这里的未知,不是萨特所谓的还未知晓的知识,而是单纯作为知识的否定形式、作为知识的对立面存在的。因此它不是认知主体的客体,也无法被语言以意义的形式表述出来。^⑨要接触、感受这个未知,只能通过语言的献祭,通过牺牲文字的表意功能,让其潜在的另一种“强的交流”功能展现出来。这种强的交流是一种“内在体验”(expérience intérieure),是“客体与主体的融合”,而在这融合之中,体验同时既是“非知(non-savoir)主体”又是“未知客体”(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21)。《内在体验》一书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谈论这种超越文字表意性的交流。它颠覆了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

认知行为,不再是主体通过理性对未知客体的把握与占有。其核心是主体出离自我,与客体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融合。

在此意义上,萨特提倡的介入文学,默认世界完全透明,试图将世界以知识的形式传递给读者,这种建立在语言表意性基础上的交流,更像是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做法。它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具有积极意义,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将作品核心内容和观念传递给读者,但是却同时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文学承担的任务和功能与日常交流无异,其目的就是传达某些理念、教条乃至意识形态,那么它是否还有资格占有一个独特的领域,是否科教读物、广告宣传或政治檄文也可以被称作文学?而巴塔耶所谓的真正的文学交流,即强的交流,并非试图通过语言直接说明某些道理,给出答案,而是承认理性和语言的无力,通过文字的形式美学将读者带向世界更深刻的晦暗。在此,文字不再用以表意,而文学也不再用以传播知识与观点。反之,文字的排列与组合变成了纯粹无意义的形式,成了一种耗费活动。在这之中发生的,是主体同客观世界的合二为一,用心去体验认知、理性与语言所无法理解与传达的东西。

巴塔耶从语言的角度作出的对萨特文学观的反思,可以在布朗肖和巴特的文字中找到呼应,二人所针对的,也正是萨特秉持的语言的透明性与表意功能。布朗肖在《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一文中,抨击了萨特的观点:“作家的职责就是称猫为猫。”(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304)也就是说,文学的核心就是清晰表意。“称猫为猫”,意味着文字要正确指涉与界定对象。而布朗肖则认为文学并不建立在语言的这种界定与命名(nomination)的能力之上,因为命名意味着将猫的现实存在抹杀,使之变成一个僵化的“猫”的概念。^⑩由语言构成的文学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悖论,因此文学必须承认与接受写作本身的无力,然后在沉默中将世界的原貌呈现出来,呈现出未经理性光芒照耀、充满晦暗与不透明的世界。这才是文学的交流,强的交流,“就如同黑夜一般”(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311)。^⑪相似地,巴特在《卡夫卡的回答》开头所针对的,依然是萨特的介入文学。他从符号学的角度阐释文学,认为它不是语言的所指,即意义,而是符号本身,即形式。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指涉了什么样的概念,表达了何

种意思,而在于这种表达的形式本身。而这种形式永远是询问式的、暗示性的,它对世界的呈现总是一种追问,从不给出解答。^⑨两人在文中都以卡夫卡的写作为文学的典范,强调文学对意义的抗拒。“城堡”所指何物,“审判”又是什么,没人可以用语言给出一个确切而明晰的阐释。但在阅读之中,存在的终极疑问却不断被置于读者面前,让读者在存在本身的孤独、陌生与荒诞中体验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刻共鸣。而这也正是巴塔耶所追求的真正的文学交流,主体与世界超越理性的融合。

三、文学与现代性:积极的肯定或无用的否定

阿多诺在他评论介入的文章之中,阐述了文学现代性的悖论。他说艺术有两个极端,一端是完全取消与现实界限的所谓介入艺术,而另一端则是完全否定同现实的关系、纯粹追求形式探索的“为艺术而艺术”。现代文学摇摆两个极端之间,并没有办法在二者间划清界限,“我们无法区分萨特的山羊和瓦莱里的绵羊”(Adorno 285—288)。进一步讲,艺术同现实之间必然存在区别,不可一概而论;但另一方面,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平地起高楼,不是凭空而来(creatio ex nihilo),它都源自经验现实。阿多诺因此总结道:“任何文学作品的一切内容、一切形式范畴,哪怕其形式是迂回婉转、无法辨别、连它自己都认不出来,也是源于经验现实,而这经验现实正是它试图挣脱的。”(300—301)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存在于这样一种张力之间:它必然来源于客观世界,来源于经验现实,但是它却不断试图挣脱现实的束缚,以求创造自己独立的场域。因此,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被看作一种否定的力量,文学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社会与世界的否定与抗拒。这种否定性既是文学同客观现实的联系所在,又是文学自主意义的体现。

综合前文所述来看,萨特和巴塔耶实际上处于现代性的两个极端。萨特弘扬介入文学的目的,是让文学退下神坛,取消其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地位,将其同化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让其成为我们日常交流、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式之一。在这背后,是萨特的一种肯定论断,

肯定文学作为功利活动的手段,肯定理性对未知的把握与占有,肯定作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巴塔耶的文学愿景则完全处在萨特的对立面,他强调文学的至尊性,力图在一切人类活动中为文学开辟一块单独的场域,独立于社会法则之外。这背后是巴塔耶对否定性的独特理解,否定工具理性的权威,否定文学在任何世俗领域、任何“有限经济”(économie restreinte)体系下的意义与作用。

不可否认,介入文学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在法国,统治着美学领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某些方面是同学院派与反动的潮流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何涉及存在与介入的内容在此具有这种革命色彩”(Adorno 302—303)。萨特敏锐地认识到了新的阶级矛盾出现了,认识到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已经进入历史舞台,因此他对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文学进行批判,力图将文学从旧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成为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试图唤醒在作家身上沉睡的知识分子身份,唤起作家的时代良知,将时代的精神品质与道德注入文学。在此意义上,萨特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将否定之否定即为肯定的辩证史观赋予文学,让其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他因此不理解波德莱尔为何会如此迷恋恶的主题,不理解作家为何会刻意违背社会道德,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恶而作恶,这很明显是故意去做与我们所一直承认的善所相反的事。这是去希求我们所不愿的,因为我们一直痛恨邪恶的力量,而不去希求我们所愿的,因为善从来都是深刻意愿的对象与目的。”(*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189)在萨特看来,文学的道德即为社会的道德、历史的道德,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与历史的肯定论断,生产现实层面的积极意义。

但是问题在于,文学是否是介入的一个好的选择?除去文字所传达的意义与信息之外,文学本身具有艺术形式,而正是凭借形式的客观惰性,文学得以反抗与否定社会和历史,为自己开辟出自主的空间。萨特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高于形式,这反而消解了文学本身的特性,让其有了被其他一切文化产品所替代的危险。阿多诺便批评萨特的极端主观主义,执着于作者的主观思想,而对文学形式的客观性不够重视,认为这种高度提纯的抽象理念与简单的外在形式相结合,完全适用

于文化工业(industrie culturelle)。任何商业广告与政治宣传都可以以此为模板,对所谓的介入文学产品进行批量生产,甚至利用与歪曲作者的本意(Adorno 291)。这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一旦承认美学形式的惰性,承认文学的否定性,作者便往往无法做到萨特所倡导的那种完全的介入。萨特自身的创作历程就是最好的写照:其主要文学作品都在二战之前完成的,而在战后介入的语境下则基本放弃了文学创作,转型为一个知识分子,以各种论战文章介入政治。当他试图写就一部完全符合介入文学概念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时,却发现小说的创作根本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最终不得不放弃。也就是说,介入是必然的,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文学却不是介入的理想方式,它本质上同介入之间存在着“相斥性”。

与此相反,巴塔耶的哲学、社会学与文学思考,都遵循着对社会与历史现实的否定原则。他的普遍经济理论,便是对资本社会生产、逐利、积累与再生产的循环,对这种有限经济法则的否定;他在《色情》和《至尊性》两本书中,也分别从社会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探寻了人类世俗社会的阴暗面,那种反抗社会基本经济、政治与道德契约的原始冲动。在此意义上,便不难理解为何他会对文学与恶的关系如此着迷。巴塔耶所谓的恶,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纯粹的恶,即萨特口中“为了恶而作恶”。萨特批评波德莱尔的观点,巴塔耶反而把它用在了热内身上,他认为热内对恶有一种病态的迷恋,并不是通过恶来反抗社会,而是希望在恶中做到极致,在恶中封圣,这种态度仅仅是一种虚荣心作祟(*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289-295)。巴塔耶认为真正的文学具有恶的属性,是因为文学是耗费,是对社会逐利原则的僭越:“任何在财富总体增长的意义上从事逐利活动的人,都承认与文学相反的价值。在一个传统家庭中,诗人挥霍家产,因此是该被诅咒的。如果社会严格遵循功利原则,那么在它看来作家就是在浪费资源。”(“Lettre à René Char” 25)相对地,真正的文学应当具有普罗米修斯的精神,有勇气去僭越社会的禁忌;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罪人,因为他勇于去违背劳动社会的基本法则。^⑤因此,文学永远不可能服从社会与历史的道德,文学是作为恶、作为社会公约的否定形式存在的。

这种与萨特的积极介入相反的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驳斥。否定之否定,形式上是否定,但实质却是肯定,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历史推动力。而巴塔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纯粹的、“无用的否定性”(négativité sans emploi):“如果如黑格尔所言,行动(‘做’)就是否定性,那么问题来了,那种‘不再有任何事情可做’的否定性是会消失,还是会以一种‘无用的否定性’的形态继续存在。”(Bataille, *Choix de lettres* 131-132)^⑥如巴塔耶所言,否定不是行动,不是为了创造新的价值与财富,否定就是“无事可做”,单纯的自我消耗直至死亡,而文学就是这种无用的否定性的表现形式。但是这种观点绝非虚无主义,绝不是自我封闭与沉沦。无用的否定性依然有积极意义,依然在创造价值,只是这种价值是另一层面的价值,无法用基本常识定义,无法用理性去把握,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因为它超越了辩证法,超越了一切客观现实与社会历史、一切有限经济的逻辑。无用的耗费在具体的社会层面解除了外部法则、道德与义务对主体的束缚,解除了历史对主体存在时间上的悬置;在语言层面解除了意义与内容对主体交流的异化。它所做的,是让人主体性彻底享受存在当下、本真的状态,接纳人身体深处原始的野性、冲动与激情。在文学上,以耗费为根本原则的恶具有至尊的价值,它并不是“道德的缺失,它要求一种‘超道德’”。这种“严格的道德”的基础是对恶的“心照不宣”,正是这种对恶的共同意识构成了“强烈的交流”(*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171-172)。也就是说,文学所要做的是将主体性的本真状态从外部社会道德中解脱出来,还原其至尊的地位,而且试图将这种状态通过超越语言意义之外的更高级的交流传达给读者。巴塔耶并不反社会,他承认历史辩证法对自古及今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承认在危机时刻介入的必要性。但是他同样认为人不能永远如此被异化,人需要在某些时刻、某些条件允许的时候,释放自己本能的冲动,短暂地恢复主体的至尊性。文学所能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场域,甚至是一个最理想的场域,这便是文学通过否定性所创造的价值。它不直接介入社会政治,但是它介入了人的存在;它反对被社会道德所奴役,但是它遵守更深层的、存在意义上的伦理道德。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对现代性作了如此定义:现代性是“解放出潮流在历史中所具有的诗意,从转瞬即逝中抽离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转瞬即逝与偶然,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与持久”(Baudelaire 694 - 695)。也就是说,现代性意味着与宏大历史的断裂,完全立足于现在与当下,从中提炼出一种永恒之美。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是一种对传统的双重否定与颠覆:一方面将当下置于历史之上,将转瞬即逝的主体性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另一方面强调审美的独立,让艺术成为独立于外部社会的自主存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萨特与巴塔耶对波德莱尔有着完全相反的评价。萨特的立场,正是波德莱尔试图颠覆的传统,一种将人的主体性纳入历史洪流、将文学创作依附于社会生产的价值观。与此相反,巴塔耶继承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思考,并深化了其否定的力量,以此重塑人的主体价值,尊重文学的自主与至尊。

对此,哈贝马斯在他关于现代性的著作中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他说巴塔耶力求“逃离西方理性因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而打造的封闭空间”,说他希望“战胜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用它那种物化的暴力压迫世界,让世界僵化成为客体的总和,被技术利用,被经济剥削”(Habermas 251)。这段评论难免会让人联想到阿多诺对萨特的批判,萨特的介入文学所遇到的问题,正是巴塔耶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纠正与解决的。而他的做法,是去“打破对主体性的限制”,即“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行为的胜利”所带来的局限,让主体重新发掘“曾一度被诅咒的本能冲动”,以获得“它的解放”,“让它进入真正的至尊领域”(Habermas 252 - 253)。从这个层面上看,虽然萨特的介入文学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现实积极的功用,而巴塔耶则主张文学的无用性,但是相比于前者,巴塔耶立足否定的文学观也许更具有深层次的肯定和积极意义,因为它不是对社会的顺从,而是一种反思,一种对人类存在问题的修复。文学的无用反而是它最大的功用,这才是巴塔耶文学愿景的核心意义。

注释[Notes]

① 有关介入文学的发展历史、理论梳理与论争,详见拙文

赵天舒:《西方文论关键词:介入文学》,《外国文学》5(2018):112—126。法国学界有关介入文学与萨特文学观的研究成果颇丰,在近些年的出版作品中,Benoît Denis. *Littérature et engagement: de Pascal à Sartre*. Paris: Seuil, 2000. 对文学与介入的关系,从历史、文学与哲学的角度,作了翔实的脉络梳理与理论分析,既回溯了文学与介入这一对概念在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演变,又着重分析了萨特介入文学的独特地位与意义,对相关主题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② 详见 Theodor Adorno. “L'engagement.”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Trans. Sibylle Muller. Paris: Flammarion, 1984. 285 - 306;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 Paris: Seuil, 1993. 137 - 188; “La réponse de Kafka.”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 1270 - 1273; “Écrivains et écrivains.”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 1277 - 1282; “La littérature, aujourd'hui.”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 1283 - 1291.

③ 巴塔耶对“法国理论”思想家们的影响,无法简单用几句话概括。但如果仅限于文学这一领域,那么他的挚友布朗肖无疑延续了他的思考。巴塔耶于1943年出版《内在体验》一书,而萨特在1947年出版的《什么是文学?》中对巴塔耶这部著作作了一些影射与讽刺,以表达一种截然相反的文学愿景。布朗肖则秉持着与巴塔耶相似的文学观,于1947年发表题为《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一文,与萨特的《什么是文学?》针锋相对,坚定地站在巴塔耶一边。详见 Maurice Blanchot. “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 *De Kafka à Kafka*. Paris: Gallimard, 1981. 11 - 61. 此外,就巴塔耶的“内在体验”,布朗肖在其两部著作《失足》与《无尽的谈话》中有进一步讨论,不仅对这一概念作了阐释,更进一步深化了巴塔耶的思考。详见 Maurice Blanchot.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Faux Pas*. Paris: Gallimard, 1971. 47 - 52. “L'expérience-limite.”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300 - 322.

④ 关于萨特与巴塔耶文学观的对比研究,参考 Denis Hollier. *Les Dépossédés: Bataille, Caillois, Leiris, Malraux, Sartre*. Paris: Minuit, 1993; Jean-François Louette. “Existence, dépense: Bataille, Sartre.” *Les Temps modernes* 602(1999): 16 - 36; *Lignes (Georges Bataille — Jean-Paul Sartre)* 1(2000).

⑤ 介入 engager 一词本义为 mettre en gage,意为将某物抵押、典当出去作为担保。在此意义上理解,将文学介入社会,意味着将文学作为达成某一目的的保障抵押给社会,其本身仅仅是一种手段或工具,重要的是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

⑥ 早在《内在体验》一书中,巴塔耶已经提出,内在体验不承认任何外部权威,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权威。见 Georges Bataille.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5. Paris: Gallimard, 1973. 18-21.

⑦ 见 Jean-Paul 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Situations*. Vol. 2. Paris: Gallimard, 1975. 64; Georges Bataille.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157.

⑧ 在巴塔耶于1943年发表《内在体验》之后,萨特撰写题为“一个新神秘主义者”的文章,对前者的作品进行批判。详见 Jean-Paul Sartre, “Un nouveau mystique”, *Situations*, Vol. 1 (Paris: Gallimard, 1947), 133-175.

⑨ 关于萨特与巴塔耶对于“未知”的不同理解,详见 Alain Milon. “L'expérience-limite: le discontinu de la nomination.” *Cahier de l'Herne: Maurice Blanchot*. Eds. Éric Hoppenot and Dominique Rabaté. Paris: Éditions de l'Herne, 2014. 359.

⑩ 见 Maurice Blanchot. “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 35-40.

⑪ 关于对布朗肖沉默、中性与黑夜概念的解读,详见尉光吉,《爱的三重奏——布朗肖的黑夜体验》,《文艺研究》2(2019): 28-36。

⑫ 见 Roland Barthes, “La réponse de Kafka”. 1270-1273.

⑬ 见 Georges Bataille, “Notes;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Œuvres complètes*, Vol. 9. 437-438.

⑭ 巴塔耶从未在其作品中提出过“无用的否定性”,这一概念出自他于1937年写给柯耶夫的信。巴塔耶在出版《有罪者》一书时,将这封信的草稿置于附录中一并出版,题为:“给X的信,他讲授一门关于黑格尔的课……”详见 Georges Bataille, “Lettre à X., chargé d'un cours sur Hegel...” *Le Coupabl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5. 369-371. 这封信的全文则收录于巴塔耶的书信集中,详见 Georges Bataille, *Choix de lettres (1917-1962)*. Ed. Michel Surya. Paris: Gallimard, 1997. 131-136. 柯耶夫于

1933年到1939年间,在巴黎的法国高等研究院讲授一门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课程。该课程云集了当时法国思想界的诸多大家,巴塔耶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在这封写给柯耶夫的信中,表达了他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反对意见,并提出了“无用的否定性”这一概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orno, Theodor. “L'engagement.”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Trans. Sibylle Muller. Paris: Flammarion, 1984. 285-306.

Bataille, Georges. *Choix de lettres (1917-1962)*. Ed. Michel Surya. Paris: Gallimard, 1997.

---.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5. Paris: Gallimard, 1973. 7-190.

---. “Lettre à René Char sur les incompatibilités de l'écrivain.”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2. Paris: Gallimard, 1988. 16-28.

---.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Œuvres complètes*. Vol. 9. Paris: Gallimard, 1979. 171-316.

Baudelaire, Charles.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2. Paris: Gallimard, 1976. 683-724.

Habermas, Jürgen.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 Trans. Christian Bouchindhomme and Rainer Rochlitz. Paris: Gallimard, 1988.

Sartre, Jean-Paul. “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 *Situations*. Vol. 2. Paris: Gallimard, 1975. 7-30.

---.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Situations*. Vol. 2. Paris: Gallimard, 1975. 55-330.

(责任编辑:王嘉军)